

文
学
翻
译
批
评

— 理论、方法与实践

赵秀明 赵张进 著

WENXUE FANYI PIPING

文学翻译批评

——理论、方法与实践

赵秀明 赵张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赵秀明,赵张进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601-5631-6

I. ①文… II. ①赵… ②赵… III. ①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035 号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

赵秀明 赵张进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邵宇彤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5.625 字数:467 千字

ISBN 978-7-5601-5631-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封面设计:匡秋爽

吉林省金山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0 年 4 月 第 1 版

2010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批评的性质	(1)
第一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	(1)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	(4)
第三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	(5)
第四节 翻译批评与哲学	(7)
第二章 翻译批评的观念	(10)
第一节 翻译批评与本体论	(10)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可能与限度	(12)
第三节 翻译批评的权利话语	(12)
第四节 翻译批评的文化氛围	(13)
第五节 翻译批评的学科构成	(19)
第三章 翻译批评的原则	(20)
第一节 科学准确	(20)
第二节 客观公正	(21)

2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

第三节 忠实地再现原文	(22)
第四节 精湛的翻译艺术	(23)
第四章 翻译批评的标准	(24)
第一节 翻译批评标准的设定	(24)
第二节 设立批评标准的依据	(28)
第三节 批评标准与价值评判	(30)
第四节 翻译批评标准的多元性和同一性	(32)
第五节 几种具体性批评标准	(33)
第六节 文学翻译作品的批评标准	(35)
第五章 翻译批评的形态	(40)
第一节 翻译与社会	(40)
第二节 翻译与译者	(60)
第三节 翻译与译本	(65)
第四节 翻译与读者	(111)
第六章 翻译批评的角度	(136)
第一节 艺术风格	(136)
第二节 思想内容	(138)
第三节 整体把握	(140)
第七章 翻译批评的方式	(141)
第一节 审美体验	(141)

目 录 3

第二节 理性分析.....	(142)
第三节 价值判断.....	(142)
第四节 中国传统的翻译批评方式.....	(143)
第五节 西方译论中的主要批评方式.....	(149)
第八章 翻译批评的方法	(152)
第一节 自然科学方法.....	(152)
第二节 比较文学方法.....	(158)
第三节 边沿学科方法.....	(161)
第九章 翻译批评实践	(162)
案例一：思想内容批评.....	(162)
案例二：翻译艺术批评.....	(165)
案例三：形式主义批评.....	(170)
案例四：形似与神似批评.....	(175)
案例五：翻译风格批评.....	(187)
案例六：意境批评.....	(243)
案例七：比较批评.....	(257)
案例八：定量分析批评.....	(273)
案例九：原型批评.....	(284)
案例十：互文批评.....	(300)
案例十一：格式塔批评.....	(312)
案例十二：接受美学批评.....	(322)
案例十三：阐释学批评.....	(336)
案例十四：目的论批评.....	(342)

4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

案例十五：社会历史批评.....	(359)
案例十六：意识形态批评.....	(370)
案例十七：文化学批评.....	(377)
案例十八：女性主义批评.....	(385)
案例十九：生态批评.....	(389)
案例二十：空间批评.....	(394)
后记	(404)

第一章

翻译批评的性质

翻译批评是批评者（家）以鉴赏为基础，以翻译文本为中心所作的理智判断和价值评估。把握和理解翻译批评的性质，有必要分清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三者间的关系。准确地划清三者的界限，是理解翻译批评的基础。

第一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

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翻译鉴赏是翻译批评的基础和前提，即鉴赏中的感知、共鸣以及再创造等都是开展批评的先决条件。因此可以说批评是鉴赏中高层次的表现，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二是鉴赏以批评为导向，即鉴赏中偏重于个人感受的活动、译本中丰富深刻的内涵及美点的发掘以及优秀译作的选择都需要批评的指导。所以克罗齐说“批评是教人阅读的艺术”。杜夫海纳认为批评的功能之一“就是揭示作品的意义，教育公众，因为公众没有批评家在行，单靠他们自己的才智是不可能理解作品的”（《美学与哲学》，156页）。

但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性质上，翻译批评具有科学理论性，鉴赏具有自由随意性。翻译批评是客观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它着眼于科学的分析、判断和研究，与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者或批评家的理性认识和冷静思考有关。这就是说，翻译批评是一项科学性、理论性很强的工作，它需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经过认真的分析，合乎逻辑的推理，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忌主观臆断。俄国文艺批评家、翻译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批评是哲学意识，艺术是直接意识。”（《别林斯基论文学》）这一深刻见解对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同

样具有区别意义。而翻译鉴赏则是直接的，它诉诸鉴赏者或鉴赏家的主观感受、想象和体验，与调动个人内心的经验与情感储存有关。可以说，翻译鉴赏纯粹只是个人的、消闲性质的活动，自由随意，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趣味无争辩”，“旁人无可厚非”，是对鉴赏的高度概括。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那样：“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显然，这种“各执一隅之解”的偏颇是批评所应尽量避免的。

第二，在取向上，翻译批评具有客观公正性，翻译鉴赏具有主观偏向性。翻译批评必定要依据批评者（家）一定的翻译经验、一定翻译观念和批评理论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选择一定的切入角度和阐释手段，运用一定的价值尺度，对译文进行研究、作出评价和对照比较。翻译鉴赏比较注重艺术消遣和精神享受，往往只从鉴赏者自己的兴趣出发选择鉴赏对象，只从自己的直观感受臧否译者译作，只满足于对译本中蕴含的美学意韵的品味，停留在译作提供的故事框架、遣词造句，意境氛围上，而不再对译本作更深入一步的思想和哲理上的探索，它是一种终极性阅读，一般不再分析自己的阅读经验，只停留在单向接受以及自我愉悦状态，无须继之以翻译批评。尤其是当文学翻译鉴赏由应用性转向审美性，这时的鉴赏，就更重在品味欣赏，重在概括审美对象的特征，传达自己的审美感受，而不作深入具体的分析，更不作评价，如“使人味之不倦”这类提法。虽然鉴赏者甚至鉴赏家在翻译鉴赏中自然也会有判断，但是他们并不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判断作为一种信息反馈到翻译界去，而仅仅只和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及内在思考有所联系。

第三，在主体素质上，翻译批评是专业技能性的，需要有比译者更高至少是同等水平的双语与审美感受的能力，并要具备超过译者的理论水平。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说：“要判断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从经验方面说，我们当然不是但丁，但丁也不是我们；但是在观照和判断那一顷刻，我们的心灵和那位诗人的心灵就必须一致，就在那一顷刻，我们和他就是合二为一。我们渺小的心灵能应和伟大心灵的回声，在心灵的普照之中，能随着伟大的心灵逐渐伸展，这个可能性就全靠天才与鉴赏力的统一。”鲁迅在《再论重译》中指出：“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译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都说明批评家的理想素质一般应高于译者。而鉴赏可以是一般性阅读，也可以是较高境界的接受。具备一般的语言

能力，可以获得浅层次的鉴赏，具备较高语言水平和欣赏能力，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享受，但都是鉴赏。当然，按照现代阅读学理论，读者也有合格不合格之分。所以读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尽力去当作者的知音，比译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这是“理想的读者”一类。作为“理想的读者”，他能从译作中获取原作者所寄予的绝大部分审美信息，并能准确地填补译者有意留下的空白，使译作获得再一次的生命。这就需要读者有广博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经验，需要有较强的感悟能力与审美能力，尤其要有较深厚的双语功底。

最后，在对象上，翻译批评具有复杂多向性，翻译鉴赏具有单一确定性。翻译批评除了对译者、译本的解析，还包括对翻译史和某种翻译思想的宏观把握，对某种批评原则的阐释，以及对翻译理论的批评。而普通鉴赏者在阅读型鉴赏中所面对的，只有译品这个单一确定的认识对象。他可以抛开其他的一切，只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意境氛围的影响，语言艺术的陶醉等表现自己的阅读体验，而无需考虑那些在批评时必须考虑的、与翻译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

许多谈翻译批评的文章、著述，正是没有分清翻译批评与翻译鉴赏二者的关系（当然这也与翻译鉴赏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极有关系），总是将一些鉴赏性的文字当作批评看待。如有的著述在总结批评方式时，提出一种“感悟式”批评。感悟式其实就是主观印象式或经验式，其特点是较多地注重自己的感受和领悟，不是从具体的分析和概括入手，而是偏重于主观的体会和含蓄蕴藉的表达；不是侧重于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是侧重于直觉的领会和体验；不是条分缕析的严密论证，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比喻。这些特点正是鉴赏中的特点。鉴赏者的三言两语往往耐人寻味，引人联想，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和发挥的余地，读者可以从其含蓄隽永的术语表达中体会到十分丰富的内涵。鉴赏一般不需要翻译观念的指导，因而它有时显得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甚至会从错误的感受中引出错误的结论。有的甚至难以捉摸，有的朦胧模糊，难以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实质内容，让人无所适从。可见，感悟并不是批评，它除了给读者留下一种优美的印象之外，并不像批评那样对所关照的问题有较深入的理性把握。

不过真正的鉴赏家，也确能深刻洞见译作的佳妙，三言两语便确能点到译作的本质，甚至有精辟深刻的见解，这是鉴赏家的本领。因为他们有深厚的审美功底，学术造诣也很好，双语语感以及文字的感受力和敏感性确有过人之处，这是在长期的翻译鉴赏中积累起来的功夫。但他们也是鉴赏家，不是批评家。如林以亮、奚永吉对夏济安译《古屋杂记》的鉴赏就是如此，他们的鉴赏

并未作理性分析，只是主印象式的体悟和感受。尤其是诗歌翻译中的批评更是如此，大多不对诗歌翻译语言学微观层面的分析，只是出于感想式的欣赏。而真正的翻译批评则应依据一定的学理，具有可操作的模式，逐步展开讨论。如黄果昕在《英语格律诗汉译标准量化及其应用》一文中，根据英语格律诗内在特点，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客观的批评模式，其中几项“最重要的格律因素依次为：分行情况、各诗行的音步数、各诗行的音节数和韵式。因此，一首诗是否在形式上忠于原作或者忠实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分这四个层次来观察，而且对每个层次的情况可以分成三个档次。”这才是真正的批评操作，既可以指导批评实践，也可以防止那些随意将诗歌译成散文的做法。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

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体现在翻译批评的发展与成熟有赖于翻译理论的发展成熟，即批评必须在正确的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开展，必须根据翻译理论体系所提供的范畴、规范、方法、标准，运用其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才可能正确表述自己的见解并为他人所接受。离开了这个基础，批评者与译者、读者以及其他批评者之间的“对话”将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区别体现在两方面：首先，翻译理论是作为一个逻辑完整的体系而存在的，它有其自身的规律，亦即它独特的学科性质或独立性，其中的种种命题、概念互相呼应，互相证明。它注重公认的规律和既定的规范，关注正统与权威的美学观念，将一些新的、难以解释的翻译现象视为偶然现象忽略不计甚至拒绝接纳。而翻译批评由于总是直接面对新的和现实的翻译实践，随时都会对理论上的这种保守性提出挑战。因此，对于出色的批评家来说，翻译理论所提供的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他不仅可以在批评实践中灵活地运用翻译理论的种种观点，还可能根据阅读的译本重新审查种种翻译理论，认定这些观点的时效与覆盖范围的半径，甚至修正、改写乃至完全否定这些观点。其次，翻译理论用于指导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又反过来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这是一般的规律。但由于作为精神艺术活动的翻译，具有鲜明的开拓性、创造性、探索性和情感性特征，它不可能按照翻译理论按部就班地进行。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显示了自身的独立地位。即：一方面，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规范、指引需要批评作为中介，另一方面，翻译理论作为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翻译中规律的认识，往往也得经由批评加以整合，使得翻译实践中的感性经验材料便于用翻译理论的理性思维的模式来驾驭。这样，经由具体的批评使得

翻译实践中的现象层的问题能够擢升到理论层次，同时又生动形象地解释具体的翻译是如何运用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的，这是单纯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都无法达到的。历史上凡有新的翻译观念的出现、翻译理论体系的形成、翻译客观规律的揭示，都是在大量翻译批评活动之后，在材料的积累、思想的酝酿等条件逐步形成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于是，翻译批评作为理论的试金石，批评家面对现实的译作，运用一定的翻译理论，发表自己较为完整的意见，充当了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第三节 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

首先，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批评以实践为基础和对象，并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翻译批评首要的是对译作为施以评价，这意味着翻译批评与翻译艺术和技巧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表现在这样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翻译艺术及其译本是批评的前提和目标，其价值是批评的着眼点，因此，翻译批评的理论背景和价值取向，对翻译艺术及其译作的判断和评价，便具有对译作及其艺术技巧进行鉴定和筛选的意义，并通过这种鉴定和筛选力图制约和影响翻译艺术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翻译史上，一种翻译思想和技巧、某种译作和风格的勃兴并形成一个时代的翻译主潮，除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外，往往得力于一定的翻译批评。这种批评以其鲜明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形成某种导向或规范，直接影响着翻译事业的兴衰和发展。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学翻译事业以及全新的翻译风格，就与当时批评的导向密切相关。当然，翻译活动本身也促使一定的翻译批评的成熟、变化、更新和完善。二是翻译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具有个体化创造的特点。翻译批评既然以译作为主要评价对象，就必然要从中寻求、发现、总结这种译作的翻译经验和艺术规律，给予一定的价值判断，从而将个体的翻译经验上升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总结，推动翻译事业总体上的繁荣、发展和进步。

其次，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第一是二者的性质不同。批评主要是在感性体验的基础上的理性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或科学的，而后者主要的渗透着理性的感性活动，本质上是艺术的，尤其文学翻译。其次是目标不同。译者一般只关注原作中所展现的艺术图景，他们先理解它，然后以形象的手段艺术地再现出来。而批评家则是通过具体译本的阅读和研究进而认识、了解译本和译者，以对具体译本的品评、分析进而影响译者的翻译。再次是二者的使命不同。翻译家在准确理解原文后，将自己精心结构的译作呈现给读者，便完成了

6 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

使命。而批评家的目的除了通过研究译作和原作来规范、引导译者外，还要考察与翻译有关的众多现象，参与理论建设，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等。由此可见，批评家并不一定要履行翻译家的职责，也就是说，批评家在认真阅读译本，仔细对照原作后，根据正确的翻译观念与相关理论，指出译作问题症结，肯定其优点，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明示应采取的方法技巧，不一定非要拿出自己的译文。他也可以提出一个供参考的译文，但目的是为译者改进译文提供思路。古罗马著名的批评家贺拉斯在其《诗艺》中曾用磨刀石与钢刀比喻批评与作家的关系。他说：“我不如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吸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吸收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19世纪著名的俄国三大批评家之一的别林斯基自己也并不创作，却成为一代作家的导师。这说明实践与理论的分工应该是明确的，不从事翻译的专业的翻译批评家也应得到鼓励。罗根泽说：“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中国文学批评史》，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这句话的潜台词应是呼吁那些脱离作家身份的批评家的出现，这对翻译批评也是重要的。

当然，由于批评也具有创造性，加以批评家具有比译者更深厚的理论修养，甚至在语言功底和美学感受方面也会超过译者，因此他在核对原作时，会比译者理解原作更深，也会由语言表达能力更好而觉得译者的作品不尽如人意，这时也会郑重提出自己的译文，这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是在自己阅读原作，理解原作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语言功底和美学感受译出的作品，使译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一位批评家的译文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位批评家的批评对象。尤其是不能将综合别人译本中的精华，算作自己的创造。反过来，译者受到批评家的批评，如觉得难以接受，也不能非要批评家拿出他的译文才服气。更不能以批评家不能翻译而不接受其批评。这时应该如鲁迅说的那样，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看书琐记》）。译者必须意识到自己主要运用的是形象思维，不一定善于抽象概括和理性思考，对自己所传达的对象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批评家却没有这样的局限，他们可以超越译者的视野去看译本，而且还由于他们长期以译本为研究对象，可以早到“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准确地评价译本的高下优劣。事实上也是如此，批评家一般都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修养与理论背景，他往往站在比译者更高的

视点上，帮助译者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译本，进而提高翻译技巧和艺术。批评家对译本甚至原作深层意蕴的发掘也往往会高于译者一筹，因此而对译者具有启发性，对译本艺术价值的评估也由于置放到更大的视野中去考察而更显客观、中肯。这是批评家对译者潜力的确认、翻译艺术的总结能够起一定的规范与指导作用的原因。

第四节 翻译批评与哲学

从批评本身论，无论何种批评方法或批评模式，从范畴、概念、规范到标准和方法体系，背后都是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因此，翻译批评最终还是受着哲学的影响和制约。仅从西方现代翻译批评研究的历史源流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赖以滋生的哲学土壤。西方译论流派甚多，演化甚快，彼此间不乏渗透与联系，但是欧洲大陆与英语国家的译论研究仍然具有不同的哲学色彩。大体上说，前者受从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一般带有思辨性与非理性。他们重视思维与意识的作用，强调翻译研究的观念性，突出人的主体精神与能动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内部关系、自我调节、整体观念与系统分析，这些都深深地打下了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烙印。后者受从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思潮影响较深，普遍带有理性主义特征，具有本体论倾向。他们主张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注重实际，不尚虚无，更多关注的是事实而不是观念，是考证而不是批评。其批评研究方法论反对形而上学，提倡科学实证与逻辑分析。所有这一切又都与行动哲学、科学哲学的思潮密切相关。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作为人本主义与科学哲学的新形式相继登上哲学舞台，它们分别带有系统方法论与泛系统方法论的特征，为西方翻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欧陆派与英美派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进一步交融。

翻译批评与哲学的这种联系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古代时期，哲学问题的核心是本体论，因此翻译哲学的重点也是本体论，翻译批评主要是从客体方面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直译与意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始终是古代翻译理论的焦点，它们无一不与翻译客体——原文与译文有关。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到中世纪的多莱，从三国时代的支谦到明代末年的徐光启，尽管他们在翻译思想上各有侧重，但作为翻译对象的本体始终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近代，随着主体——人的地位与价值日益提高，翻译哲学渐渐转向侧重于从翻译主体

方面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泰特勒提出的翻译“三原则”集近代评论研究之大成。他给“好的翻译”所下的定义是：“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在另一种语言里，使得译文文字所属的国家的人能够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与使用原作的语言进行阅读的人们所领悟和感受的别无二致。”这里，泰特勒特别强调了译文阅读主体的问题。此外，他在《论翻译的原则》的结论部分又着重指出：“只有具备与原作相同才能的人，才可以充分地完成翻译者的任务。”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作为译者的主体所起的作用。与古代时期的人们着重从客体角度阐明翻译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相比，这无疑是长足的进步。在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已经变得极为重要。马克思从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社会历史观开始，实现了主体观的转变，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提出和对实践观的论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因此，及至现代时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就构成了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主体性倾向便是对当代翻译研究哲学观的概括。

翻译理论的哲学性也是由于翻译批评的对象和本身所决定的。从批评的对象看，任何文章文学都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因为作者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指导下从事写作和创作的，从中探寻生活的底蕴表达自己的意图。如译者面对哈姆雷特沉思时说出的至理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就不再看作是平平常常的疑问句或纯属个人性格上的犹豫，而是当作人生始终面临的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所以简单地译作“活动还是死亡”，并不能传达原文深刻的哲理，更应该译作“有与无，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才能传达西方哲学文化重在探讨“being”这一精神。亚里士多德就说过：being永远是一个疑惑的主题，是一个以前、现在、永远要提出的问题（《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263页，1961年）。再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以写意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寒江独钓图：众鸟飞尽，人迹罕至，在一片白茫茫，静悄悄的荒漠中，有一位垂钓的老翁。这是一般人都能感受的浅层欣赏。诗人在那里通过描绘一个宁静沉寂的世界来抒发遗世独立的高清情怀，隐喻着他对污浊纷争的现实世界的反衬和诅咒，这是鉴赏的第二层次。再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通过世界的沉寂（归于空泛）和孤舟独钓（人事的努力）两个相对的意象，可以感觉到这象征着佛门道家对人生归于虚无的理解。正如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诗人有他的抽象思维，也可以说有他的哲学。”这首诗 Fletcher 译为：

The birds have flown away from every hill,
Along each empty path no footprint seen.

In his lone skiff his bamboo garments screen
An aged fisher from the snowstorm chill.

从译诗中，我们很难看出原诗的哲学性意味。又如陈子昂登上幽州台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是一般的感物伤时、叹老嗟卑的惆怅和迷惘，而是一颗疲惫而又执着的心灵对生命价值的呼唤，体现了千百年来人对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热烈向往和企求。翁显良将这两句译为：

The world goes on, world without end.
But here and now, alone I stand—in tears.

基本再现了原诗一唱三叹的语调，与原诗一样具有一种苍凉和悲壮。所以说翻译批评家应具有哲学意识，注意挖掘和阐发原作和译作中所蕴涵的生活哲理，让读者思索玩味不尽。

第二章

翻译批评的观念

翻译批评观念是对翻译批评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和准确表述，是对翻译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其内容涉及翻译批评的目的、对象、本质、功能、作用等方面的认识，对批评主客体关系、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的阐述和把握，它直接规范着批评的性质及其方法。翻译批评观念最重要的是把握批评本体，这是因为对批评本质、特征的探究，是决定批评中一系列其他课题的前提。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把翻译批评独立出来加以研究，所以，翻译批评的观念往往是翻译理论观念的简单延伸。这就不利于翻译批评的正常展开，也不利于对翻译批评的正确认识和理论建构。

翻译批评的观念是与翻译观念既有联系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体现在：批评观念不是由翻译观念直接演绎所推导出来的现成结论，而是在大量的批评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无数批评家的提炼、概括和选择、运用，才逐步形成的各具特定内涵的批评观念体系。在一定意义上，翻译观念是一种通过翻译批评对翻译实际问题的理性反思，而翻译批评观念则是对理性的批评活动的反思，所以它应是“反思的反思”。此外，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翻译批评观念的演化并不是与翻译观念的发展同步的。有的批评家在表达新的翻译观念时，却用的是传统批评观念指导下的旧的批评模式；而用新的批评方法得出传统翻译观念的结论的例子，在当代批评实践中也是常有的。

第一节 翻译批评与本体论

本体，原本是一个哲学范畴，意指人的感觉之外的世界的本源和根据。从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中的“万有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在力图探讨世界整体存在的终极本源，被称为宇宙（自然）本体论。到中世纪，